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第一二二冊

西域佛教遺址考察記

伯希和等著 耿昇譯



中國書店

本册說明

敦煌藏經洞的開窟、敦煌文獻的發現和敦煌學的誕生，已經 100 餘年了。在西方和日本的科考、探險、考古學家們劫掠敦煌西域文物的狂潮中，法國探險家、語史學家、東方學家和漢學家伯希和是其中東方學水平合衆國文化修養最高的人，被稱爲“超級東方學家”，他的西域探險之行，也頗爲引人注目。不可否認，對於伯希和竊奪我國文物文獻的行爲，我們應予以譴責。而對於他們的研究成果，我們也應積極吸收。可是一直以來，由于缺乏相關的編譯，國內對這一探險活動，却不甚瞭解，祇是知道一個梗概。

本書稱《西域佛教遺址考察記》，是一部有關伯希和西域探險的文集。此文集是譯者特意在法國圖書館搜集各種相關資料，通過整理翻譯，纔最終集結成冊的。此書廣泛搜羅，既有伯希和西域探險的過程，其中收集各種探險筆記和考察報告，又包括了在西域各地所獲取的文物文獻，以及它們在法國的收藏保存狀況，另外，還收入了一批法國漢學家相關的研究成果。其中，許多資料是極其難得的，不僅在中國，甚至在法國也如此。此文集的學術價值是顯而易見的，它對於我國敦煌學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西域佛教遺址考察記

耿昇譯
伯希和等著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譯者的話

敦煌藏經洞的開窟、敦煌文獻的發現和敦煌學的誕生，已經 100 周年了。我國西域與敦煌歷史文物和文獻的外流，則有 100 多年了。在西方和日本的科考、探險、考古學家們劫掠敦煌西域文物的狂潮中，法國探險家、語史學家、東方學家和漢學家伯希和的西域探險，則頗為引人注目。本文試對伯希和西域探險團在我國新疆和甘肅各站，尤其是在敦煌從事考察和劫掠文物的史事，略作鉤沉。

一、伯希和西域探險團的緣起

自 19 世紀下半葉起，西方列強在對海外殖民地分割完畢之後，又掀起了一股中亞（西域）探險考古熱潮。其實，俄、英、德、瑞典、美、芬蘭等國進入西域并從事科考探險的時間，要比法國早一些。西方列強在西域探險問題上，也如同在爭奪海外殖民地和海外市場中一樣，始終都勾心鬥角，互相傾軋。大英帝國借助于在印度的有利地位和阿古柏在新疆叛亂的機會，首先妄圖染指我國新疆，于 1834 年派遣沃森（W. H. Wathen）赴于闐進行考察，約翰遜（W. H. Johnson）于 1865—1866 年考察于闐，沙敖（R. B. Shaw，邵烏）于 1870 年考察葉爾羌與喀什，弗賽斯（T. D. Forsyth）及其同事們于 1873 年考察喀什與塔里木盆地周邊地區。英國探險家賈斯理（Carey）和達爾格萊斯（Dalgleish）稍後于 1886—1887 年也前往同一地區，鮑

爾 (Bower) 少校利用一次追捕殺害達格萊什的逃犯的機會而于 1889 年到達沙雅。但這些英國人直到此時仍未考察清楚，究竟應將塔里木文化歸屬於哪一種文明，直到斯坦因受英國政府派遣于 1900—1901 年進行第一次西域探險為止。

早就對中國新疆垂涎三尺的沙俄帝國，更是不斷地派遣文武官吏對塔里木盆地南緣與喀什地區進行考察。如普熱瓦爾斯基 (N. M. Prževal'skji) 于 1870—1885 年 4 次分別對羅布泊、且末和阿爾金山諸綠洲的考察。1885 年，格倫伯切夫斯基 (B. L. Grombêcevskii) 在塔里木盆地西緣從事考察發掘。1889—1890 年間，佩夫喬夫 (M. V. Pevcov)、羅博羅夫斯基 (Roborovskii)、博格達諾維奇 (Bogdanovič) 和柯茲洛夫 (P. K. Kozlov) 分別對喀什、天山南麓、葉兒羌河上游地區作了考察，帝俄駐喀什領事館秘書雅·雅·魯特斯 (Ya. Ya. lyuts) 搜集了一大批古文獻并入藏于艾爾米塔日博物館。貝林格 (Belinko) 和帝俄駐喀什領事科洛科洛夫 (G. Kolokolov) 則將其搜集品入藏于帝俄科學院的人類學和民族學博物館。帝俄皇家考古學會東方部根據 1891 年 11 月 28 日的會議紀要，而向彼得羅夫斯基發去了一份有關在喀什地區從事考古發掘和科學考察的調查提綱。帝俄皇家科學院與考古學會，于是在 1897 年派出由克萊門茨 (D. A. Klementz) 率領的考察團赴吐魯番和塔里木盆地從事發掘工作。

瑞典人斯文·赫定于 1890—1902 年間 3 次赴西域進行考察。由格倫維德爾 (Grünwedel)、胡特 (Huth) 率領的德國考古探險團，于 1902—1903 年首開 4 次西域探險之行。由渡邊哲信和堀賢雄率領的第一個日本大谷探險團也

于同時到達塔里木盆地。

這些考古探險團都大肆地非法發掘、收購、盜竊了大量中國文物，以豐富他們各自國家博物館與圖書館的收藏。

在西方和日本爭相向中國西部派遣考古探險團的熱潮中，老牌的殖民主義者和尤為注重文化侵略的法國却姍姍來遲。但在 19 世紀下半葉，也有幾名法國旅行探險家進入過西域。如博安 (C. E. Bonin) 于 1899—1900 年、呂推 (Dutreuil de Rhins) 和李默德 (Grenard) 于 1889—1894 年、沙畹 (E. Chavannes) 于 1907 年、古伯察 (E. -R. Huc) 和秦神父 (Joseph Gabet) 于 1843—1845 年，多倫 (d' Ollone) 于 1906—1907 年、邦瓦洛 (G. Bonvalot) 和奧爾良 (Henri d'Orléans) 于 1895—1896 年都曾赴西域不同地點旅行探險。雖然法國在西域考古探險起步較晚，人數較少，但也劫掠了不少文物與文獻。因為等到法國考古探險團遠涉西域時，那裏的幾大重點考古發掘地點 (喀什、庫車、吐魯番、敦煌、于闐) 均被其他國家的同行們捷足先登了。

西方列強在西域的科考與探險方面的競爭，主要是對文物古迹的競爭，形成嚴重對峙的局面，為了在西域從事更加系統而廣泛的考察，分工對幾大重點地區進行發掘，他們決定統一協調這方面的工作。1890 年在羅馬召開的東方學家代表大會上，決定組建一個“西域和遠東歷史、考古、語言與民族國際考察委員會”。1902 年在漢堡召開的新一屆東方學家代表大會上，這個西域國際考察委員會最終組建起來了。其總部設在西方列強中離西域最近的國都——俄京聖彼得堡。在國際委員會之下，還設立了各個成員國的國家委員會。這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國家慣用的劃定

勢力範圍的老伎倆。

西域國際考察委員會的法國委員會，由法國著名東方學家埃米爾·塞納爾（Emile Senart，1847—1928年）任主席。塞納爾出身于豪門富戶，終生酷愛學術。他年輕時就深受印度佛教，特別是“北宗佛教”的吸引，成爲一名卓有成就的印度學家。他曾出版過有關巴利文語法、印度文碑銘、印度種姓制度、《正法華經》和《大事》（Mahavastu）的研究論著。他從1882年起便當選爲法國金石和美文學科學院院士，同時又受聘爲意、比、荷、俄、德諸國科學院的院士。他擔任法國亞洲委員會主席一職近30年，曾大力推動籌建法蘭西遠東學院，也曾參與組織法國赴伊朗和阿富汗的考古活動，當時正任法國地理學會主席。所以，正是他提議和推薦派遣法蘭西遠東學院的漢語教授伯希和率團赴西域考察。

法國的既定目標就是，在這場激烈的國際大競爭中，法國必須占有與其名望和地位相匹配的份額。伯希和中選是由于他學識過人，又富有在亞洲活動的經驗，精通幾門亞洲語言和擁有這方面的高水平文化知識。該團中的另外兩名成員分別是法國殖民地軍隊的軍醫、原交州（東京灣）人路易·瓦揚（Louis Vaillant）博士，負責地理測繪、天文觀察和自然史方面的工作；專業攝影師夏爾·努埃特（Charles Nouette），負責照片、圖片資料和檔案工作。整個探險團所需大部分資金由法國金石和美文學科學院、法國科學院、公共教育部共同贊助。諸如法國商業地理學會、法國亞洲委員會和自然史博物館那樣的一批學術團體，諸如波拿巴王子和塞納爾先生本人那樣的一些熱衷于贊助文化教育事業的人，也都慷慨解囊。奧爾良基金會的一筆

逾期未付款也被劃歸伯希和支配，從而使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險團置于一位大旅行家的名譽保護天下。其實，伯希和于1901年剛從越南西貢醫院出院的那天，奧爾良王子于同一天逝世于同一家醫院，真是一種巧合。

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險團就是在這樣的國際國內背景下，組建起來并出發赴西域，進行了近三年的活動。

二、伯希和探險團首戰喀什地區與圖木舒克

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險團一經組建，便立即開始了積極的籌備工作。他們在人員、資金、和設備方面的準備工作，持續了一年多。1906年6月15日，伯希和一行離開法京巴黎，走上了漫漫的近三年的西域考古探險之路。他們先乘火車，經過10天旅行後便經莫斯科和奧倫堡，到達當時俄屬突厥斯坦的首府塔什干。他們在塔什干停留了1個多月。這是爲了等待其從聖彼得堡用船運來的大批行李設備。

伯希和也需要利用這段時間，以學習東突厥語。因爲作爲語言學家的伯希和，過去祇從書本上學習過這種語言，而缺乏實際應用的機會。

伯希和一行乘火車前往安集延，他們一路上沿富饒的費爾干納河谷前進，那裏盛產棉花，遍地是森林和寶藏。8月11日，他們到達距安集延祇有10多公里的奧希(Och)，最終下了火車，開始組織赴喀什的馬隊。沙俄地方當局爲他們找到了可供雇傭的哥薩克護衛隊。衛隊長是芬蘭裔男爵馬達漢(Emil Mannerheim)，此人于中途告別伯希和而獨自從事考察。他于1939年出任芬蘭軍隊的元帥，于1944年又擔任芬蘭共和國總統。當時他是奉沙俄的命令，

赴中國西部刺探軍情和掠奪文物的。後因十月革命而無法返俄，祇好回芬蘭。他們結隊而行，一直到達喀什。馬達漢實際上是利用伯希和探險團作為自己進入中國的掩護和為此而提供方便。沙俄當局也正是以此為條件，纔為伯希和一行提供各種方便和兩名哥薩克人做護衛。這兩名哥薩克人一直陪同伯希和等到達北京，其主要任務是當伯希和一行從事考察而遠離營地時，負責看管行李物品。

伯希和一行于1906年8月間，率一支由74匹馬組成的馬隊出發，僅供馱行李的馬就多達24匹之多。他們經過塔爾迪克達坂（Taldyq Dawan，山口），再沿柯爾孜克牧場前進，曾與阿爾泰山地區的柯爾克孜女王公之子阿薩姆（Assam），有過一次頗具學術味道的交談。他們最終從伊爾凱什坦或休循（Irkechtan）越過俄中邊界。再經過20天的旅行，最終於1906年9月1日到達喀什。這是他們計劃中于中國從事考古發掘的第一站。

在喀什，俄國駐喀什領事科洛科洛夫，將伯希和一行安排在俄國領事館的一座建築物中。英國駐喀什領事馬繼業（Macartney）公爵也經常去拜訪他們，並幫助他們組織馱隊。瓦楊聲稱，伯希和在俄國人、英國人和中國人中，都很有“面子”，這是由伯希和的淵博學問和豐富的語言學知識所贏得的榮譽。

由于其他國家的考古探險團已先于伯希和一行在喀什活動過，所以伯氏一行祇在那裏作了一次人類學調查。此外，他們還從事地理調查和對道路進行測繪。

伯希和一行在喀什逗留了6個多星期，因為其最終目標是喀什東北約一月行程的庫車綠洲。在他們到達喀什時纔獲悉，德國人剛在庫車作過發掘，俄國人貝勒佐夫斯基

(Berezovskii)也曾在那裏逗留。但在1個多月的時間裏，他們分別從地理學、考古學和語言學的角度，對該地區作了考察。其考察工作集中在4個點上。

有關喀什周圍的前伊斯蘭教遺址。距喀什北部15公里左右的三仙洞是絲路上喀什的一處名勝。曾任葉爾羌幫辦大臣和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的和寧，于嘉慶九年（1804）所纂《回疆通志》卷7記載說：“回城北三十里上下……有清泉，甚甘冽，迤北陡壁之半崖，有石洞三，洞中置石仙像。”這就是著名的三仙洞。在伯希和之前，英國的斯坦因、日本的橘瑞超、德國的勒柯克都曾對這裏作過考察。但不知爲什麼，伯希和始終稱此地爲“三山洞”，可能是由于誤聽而造成的。伯希和于1906年10月10日從喀什發出一封信中，介紹了他的這次考察結果。三仙洞位于從喀什到七河的大道上，也就是在喀什城北15公里左右的那林河（Naryn）流經的地面上，于黃土高坡上開鑿了三眼洞。其土著名稱是 Utch-meravan 或 Outchmah-ravân。Utch 意爲“三”，outchmah-ravan 意爲“正在坍塌的和難以進入的洞子”。在伯氏之前，第一個也是惟一一個撰文描述過“三仙洞”的歐洲人，是俄國探險家彼得羅夫斯基（Petrovskii），其描述文發表在帝俄考古學會東方部的《論叢》第7卷中：《喀什附近的一處佛教古迹》。彼得羅夫斯基爲配合其文章，同時發表的還有從大路一側拍攝的三仙洞照片以及他繪製的一幅平面圖。德國格倫維德爾探險團于1905年考察該洞時，巴爾圖斯（Bartus）曾從山崖上用繩索滑入洞內。斯坦因第二次西域探險時，祇作壁上觀而未進入洞中去。更富有探險精神的伯希和却率瓦楊與努埃特，共同用滑車攀上了三仙洞。他們發現洞內的燒

陶層是在原層被剝落之後，重新貼上去的。這應該是 1815 年的重修層。裝飾和繪畫風格都是漢地式的。洞中原來收藏的箭矢和木簡，均被彼得羅夫斯基的衛隊長帶走了。洞中寫滿了游人題記，其中有漢人、蒙古人、滿族人和突厥人等。這大體上反映當地民族的構成。赴三仙洞參觀考察的人具有各種不同信仰，除了漢滿兩族人之外，其餘幾乎全是兵勇。信佛者在這裏有他們的“佛祖”，伊斯蘭教徒則以摧毀佛教供像來實現自己的虔誠善業。木簡證明這些洞子是于嘉慶二十一年九月（1816 年 10—11 月），由清朝將軍下令修葺的。最早的游人題記寫于 1788 年。所以，三仙洞的裝飾大部分都是乾隆皇帝于 18 世紀平定新疆之後完成的。因為塗層上寫有比繪畫更古老的題記。

伯希和繼瑞典傳教士霍貝克（Hökberg）之後，也介紹了三仙洞的開洞原因：當一位不信教國王統治疏勒時，衆仙預言其公主將來會被蛇咬死。焦慮不安的國王令人在懸崖峭壁上開鑿了三眼洞，以將公主安置于其中。他還采取了嚴密的防範措施。後來有人瞞着國王，給公主遞上去一筐水果，毒蛇藏匿于水果中，公主果然如同諸仙預言的那樣，被蛇咬死了。其實，類似的故事在西域流傳甚廣，并非獨指三仙洞。努埃特拍攝了現在很少見的幾幅三仙洞的照片，瓦楊對洞子作了全面調查，詳細記錄了洞口、中部、後部和左、右部各自的長度、高度和寬度。他還記下了洞內壁畫內容，并錄下了壁畫題識和游人題記。事實上，考察三仙洞是伯希和西域大探險的一次演習。

在三仙洞以東約兩公里左右的地方，于察克瑪克（Tchâqmâq）河南岸，便是圖古曼（Tegurman）遺址。伯希和將該遺址考證為“水磨房”。彼得羅夫斯基未曾提

到過該地區。1905年的德國探險團和1906年的斯坦因却都曾指出過它。斯坦因將該地名記作 Tigharman，後又改作 Khakan-ning-shahri，意為“大汗城”。但他却未考證清楚這個“大汗城”即水磨房。在伯希和探險中使用的地圖上，却作 Khanlya，意為“汗城”。伯希和認為該遺址群係由佛教時代（似乎是由窣堵波和南牆保護的四邊形建築）和伊斯蘭時代（西部的“炮臺”以及介于炮臺和四邊形建築之間那座尚未被考證清楚的建築）。伯希和親自率領 10 名民工，對水磨房進行了發掘，獲得了一批陶片和一個銅鈴。

在從穆斯林的喀什到英吉沙爾古漢城之間大道的左側，便是“舊城”，或“古城”（Eski-chahr）遺址。彼得羅夫斯基從未講到過此一地，斯坦因對它也僅僅是一筆帶過而已。伯希和認為應將它斷代為穆斯林時代，但却顯得相當古老。伯希和未對它作詳細描述，祇拍攝了一批照片，并繪製了平面測量圖。

對於喀什東北的汗諾依（Khan-öl, Khan-üi），也就是“汗宮”的著名遺址，伯希和作了重點發掘，特別是對其中“鴿子窩”（Kaptar-Khana）、薩喀爾牆（Saqal Tam）和哈薩牆（Hasa Tam）、“九間房”（Toqqouz-Hod-jrah）等重要考古點，都作了發掘和考察，并且均有不同程度的收獲。尤其是他還發現了一處尚未有人考證過的佛教遺址，發現了佛像殘片及幾枚錢幣。

對於喀什綠洲的前伊斯蘭文明古迹，伯希和主要對 3 個古遺址作了考察發掘。

第一個發掘點是“庫爾干窣堵波”（Koughan Tim），

伯希和又稱之爲“庫爾干牆”或“庫爾干炮臺”。斯坦因曾對該遺址作過考察并作了不太詳細的記述。

第二個考古發掘點是紅山（克孜勒—戴卜，Qyzyl-Debe），位于克孜勒蘇河的古河道左岸，距克孜勒蘇與土門河（Tümen）的交匯處祇有 3 公里遠。

第三個是“小山”（Kichik-Debe），位于紅山以西。

對於喀什地區的佛教遺址，伯希和考察了炮臺山（Mori Tim）、沙山（Topa Tim）、墩庫勒（Tong Kül）和阿克噶什（Aqqâch）等處。伯氏特別是于炮臺山作了兩天發掘，在帕依納普村發現了一個所謂的阿布達爾人（Abdal）的小聚落。

1906 年 9 月 26 日，伯希和探險團離開了汗宮，取道東南方向，前往墩庫勒。那裏是距汗宮有 6—7 公里的一片小綠洲。9 月 27 日，他們前往阿克噶什，在那裏發掘了克孜爾炮臺（Qyzyl-Tim）以及尕哈炮臺（Qaqha Tim，Tim 指“牆”或“窄堵波”）。

伯希和在喀什地區搜集到的某些佛教文物價值有限，雖然它們都是絕無僅有的。如在炮臺山發掘到一隻巨耳造像。此外還有某些非泥塑而是石膏燒陶物殘片。所有這些文物現均收藏于吉美博物館。

三、伯希和探險團在圖木舒克的驚世大發現

經過在喀什地區 1 個多月的勘察之後，伯希和考古探險團于 1906 年 10 月 26 日離開該綠洲西部的玉代克利克（Ördeklik，野鴨地），在那裏搜集到幾種罕見的玉器殘片之後，于該月 28 日到達瑪喇爾巴什（Maral-Bachi，今

之巴楚)。他們于 29 日到達圖木舒克并在該地區一直停留到當年 12 月 15 日，在那裏發現了庫車綠洲西緣惟一的一處佛教大型遺址群，因為在圖木舒克村不遠處，有一片完全被湮沒的遺址。斯文·赫定認為它是伊斯蘭時代的遺址。伯希和在該遺址中仔細地搜尋任何一種可為古建築斷代的標識。當他用馬鞭梢無意地扒拉地面時，便發現了一個屬於希臘—佛教風格的陶俑。這種半希臘半印度的佛教藝術，主要是誕生于印度河上游。它通過西域“胡人”的媒介作用，緩慢地從印度河、阿姆河與帕米爾而傳入中國中原，乃至遠東的日本。新疆是這種傳播中的一個大站。圖木舒克有一座早于公元 1000 年的佛教僧伽藍遺址。這是在伯氏之前沒有任何人發現和指出過的事實。該遺址事實上應被稱為托古孜—薩萊或托乎孜—薩拉依(Toqqouz-Saraï, 意為“九間房”或“九僧房”)。伯希和立即組織民工對該遺址進行發掘。

這項發掘工程以每天使用 25—30 名民工的發掘速度展開，共持續 6 個星期。他們對該遺址作了完整的平面測繪，出土了大批雕塑和木刻殘片、幾種奇形怪狀的陶器。他們在發掘後期，還發現了一塊類似淺浮雕陳列館的地方，淺浮雕雖已變得堅硬易碎和殘損嚴重，但仍不失其宏大氣魄。它們揭示了在 7—8 世紀期間，把中國西域與由印度—斯基泰國王統治下的犍陀羅藝術聯係起來的紐帶。伯希和發掘到的文物，運往法國後先在盧浮宮展出，後又入藏吉美博物館，曾在法國乃至整個西方哄動一時。

1906 年 9 月至 12 月 12 日之間，伯希和留下了一部寶貴的喀什與圖木舒克考古筆記。

圖木舒克(Toumchouq, tumšūq)在突厥語中的本意

是“鳥喙”，後來用于指嶮崎不平的地勢，具有指“岬角”的意思。圖木舒克村莊也確實是向南于喀什河與葉兒羌河的沼澤山谷方向延伸的岬角。此地即唐之撥換城或跋祿迦（Barukha）之故地。在 18 世紀時，則是指從南部的麥蓋提（Markat）到北部的啓浪之間的整個巴楚（Bartchouq）地區。此名相當古老，在穆斯林突厥人進入之前，它被用于指在瑪喇爾巴什地區所操的兩種近似于闐語的方言：一種為瑪喇爾巴什方言，另一種為圖木舒克方言。“圖木舒克”這個地名既未出現在喀什噶里的突厥語大辭典中，甚至也未出現在米兒咱·海答兒的《拉失德史》（1541—1547）中。這是一個突厥文名稱，但它似乎曾在敦煌藏文寫本中出現過，作 Thum-šuk。德國考古學家勒柯克曾將該遺址斷代為 4 世紀末或 5 世紀初。伯希和于 1923 年在《通報》中發表的書評指出：“我確實認為，圖木舒克是中國新疆，至少是塔里木盆地北緣最古老的佛教遺址之一……但我覺得應將勒柯克教授提出的斷代時間推遲 1—2 個世紀。”最後，伯氏認為應將其時代推遲到公元 8 世紀。

伯希和考古探險團在圖木舒克發掘到的物品，主要有雕塑、壁畫、陶器和雜物。雕刻品或版畫，主要是在托古孜—薩萊（“九僧房”）發現的，包括儀軌供像和單獨的雕像、淺浮雕和裝飾建築物的浮雕。其中的雕塑品有佛陀、菩薩、天神、王公或下層世俗人、僧侶和苦修山僧等。其主體應斷代為 6—7 世紀中葉。雕塑的主要原料是粘土和“柴泥”。其技術主要是模製。那裏的壁畫主要是用于裝飾寺院的牆壁、天花板和地面的。其中的雜物可分為宗教法器、金箔、舍利盒、還願物、世俗生活用品（珍珠、首飾、骨製品、

青銅或其他金屬品、箭頭、玻璃片、布帛和繩索、掃帚等)。它們現在均被入藏吉美博物館。

四、伯希和考古探險團在庫車綠洲的重大發現

經過在圖木舒克的發掘之後，伯希和考古探險團于1906年12月15日離開那裏，經阿克蘇和拜城，向他們的另一個重點目標庫車綠洲前進，并于1907年1月2日到達庫車。他們一行在庫車共勘察發掘了8個月，直到1907年9月3日纔離開那裏向烏魯木齊前進。早在該考古探險團離開法國之前，他們就聽說了有關庫車“明屋”(Ming-uï, Min-oïg, 千佛洞)，洞中覆蓋着7—10世紀的壁畫。而且德國人、日本人和俄國人均已先期光顧過。但由于先前幾個外國探險團都過分地專注于“千佛洞”而忽略了幾座露天寺院，伯希和一行最終在那裏發掘到了一大批木雕、印鑒、錢幣、塗漆與繪畫的骨灰盒，以及一大批寫本，特別是在一座寺院的院子裏發現了很多用被稱爲“婆羅謎”文的印度字母書寫的寫本。它們都被運往了巴黎。

在此期間，瓦楊博士測繪了庫車綠洲的一幅平面圖，努埃特拍攝了克孜爾千佛洞的大量照片，伯希和本人又親自去考察了庫車以北那條過去將裕勒都斯河(Youldouze)與帖克斯河(Tékēs)聯係起來的通道。

伯希和一行到達庫車時，德國考古探險團已經離開。他們在那裏遇到了俄國考古探險家貝勒佐夫斯基，并與之保持友好關係。一直到1907年4月間，伯希和一行都停留在庫車周圍地區。後來，伯希和制訂了自己的考察綱領：踏勘和研究庫木吐拉千佛洞，這批佛洞開鑿于木扎提河(渭